

高迅莹 著

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

● 高云览传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

● 高云览传

高迅莹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鹭 岛 篇

(1910—1937)

一、鹭江之子

他诞生于美丽的鹭岛

厦门,中国东南沿海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,福建闽南金三角的一角。

厦门,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。华侨出入的门户。

厦门,与台湾一水之隔,海峡两岸开展文化经济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。

厦门,这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辟的经济特区,早就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:据说在那人烟稀少的遥远古代,人们常看到这碧海环绕的岛上,有一大群一大群的白鹭,扑打着洁白的大翅自由自在地翱翔在海岛上空,它们遨游累了,便就岛栖息,以这独有的奇花异树的海岛为家,繁衍生息,代代相传。白鹭,为这海岛增添了绚丽,增添了神采,增添了诗意……人们因此把这海岛称为“鹭岛”“鹭江”。在这神奇的鹭岛上,除了青山叠翠,还有海、岩、洞、花、木等诸种神秀,绚烂多姿。这里,冬无严寒,夏无酷暑,四季常青,山明水秀。这鹭岛呵,古往今来,都是人们向往的地方,至 1387 年(明洪武 20 年)为防御倭寇入侵,在岛上建筑城堡,设厦门城,从此这鹭岛便称为厦门。

鹭岛，她以丰富的乳汁，哺育了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，几百年来，他（她）们在这块土地上耕耘，开拓，建设，斗争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，厦门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，这其中包括：1841年乡民武装击退了英军的入侵；1853年小刀会云涌起义痛击封建专制的清皇朝；1899年人民群众坚决粉碎日本侵略者强占专管租界的阴谋；1905年坚持长达半个世纪的收回海后滩英租界的斗争。直至1910年全国到处出现风起云涌的自发性群众斗争，厦门人民奋起卷入一场即将来临的狂风暴雨，孙中山领导的第十次武装起义——辛亥革命爆发，它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，它预告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皇朝行将覆灭。

就在这一年，1910年5月14日，在厦门的一条主要街道——桥亭街，一户清寒人家，一个男婴呱呱降临到这个战乱动荡的世上，小宝宝的父亲高氏抱着这初生的宝贝，内心充满了喜悦，哄呀，摇呀，在屋里来回地走，在他哄完一阵宝宝之后，便对宝宝的母亲说：“大名叫怡昌好吗？”宝宝的母亲和祥地笑了，说：“好听，好听。”但在四十多载后，他却以高云览这个响亮的名字，铸就了气壮山河的诗篇《小城春秋》。

从此，这高家便有了两个男孩，那大的叫怡吉，已经4岁。家里因为添丁，红火了许多，那新生男婴的哭声真响亮，真有力，也许他在呼唤希望？也许他在哭诉人间不平？每当这时候，就伴随着母亲如歌似诗的哄呵声：“昌儿——呵，昌儿——呵，哭声像响雷，一定会昌盛……昌儿——呵，昌儿——呵，快快长大，跟着大人去闯荡，我的宝宝有出息……”

高家，把莫大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希望这孩子和他哥哥将来都能带来“吉祥”，带来“昌盛”，带来“富裕”，带来“幸福”；希望孩子将来改变这日渐穷困的家境；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。

小怡昌的诞生，给鹭岛添了一名男丁，鹭江的甘甜乳汁，鹭江的清净空气，鹭江欣欣向荣的万物，抚养他茁壮成长；白鹭的双翅将载他飞向广阔的自由天空。

小怡昌诞生后，家庭虽不富裕，但因人口少，双亲与两个孩子，4口之家，生活却也过得去。

怡昌的父亲高春圃，1855年出生于同安刘五店。他是个出名的忠厚人，少年时代随父母迁到厦门。他读过私塾，喜欢古文，推崇陶渊明诗作，画一手眉清目秀的国画，家中藏有不少古书籍。他在二儿子出生后，随着革命的浪潮，把拖在脑后的长辮剪了去。19世纪末，他像鹭江畔无数男子闯江湖一样，带着可怜的行装在五光十色的南洋埠头去探索生活道路，磨破了脚皮，晒焦了皮肤，最后在荷属安汶定居下来，凭他的聪明才智，他流下一滴滴汗水，一分一分积累，长年累月的挣扎，以刻苦耐劳的毅力在安汶开了一列商店，经营胡椒、椰干、咖啡等土产品，其间熔铸了多少辛酸血泪！生意才越做越兴旺。

高春圃重感情，一年，两年，三年……时间似流水东去，飘洋过海的他不时想念家中贤慧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们，思念之情使他安不下心，他把生意托付给一个侄儿去掌管，自己跑回国和家人团聚。不料侄儿好赌，几年后，把他苦心经营的一点产业连本带利赌个净光。生意濒临破产，他只好再次南渡去收拾残局。

高春圃在安汶呆不下去了，只好回国。起先，他在厦门街声喧嚣的桥亭街，开办一家小酒店，自酿自售“老酒”，那时桥亭街两旁开着许多杂货铺、药铺、小吃铺，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摊点：五香肉包、卤面、芋包、韭菜盒、油葱粿、蠔仔煎、鱼丸汤、米线糊等等，人来人往，热气腾腾，高春圃的小酒店位于这样的闹市，加上他和蔼可亲，可说是天时地利人和，生意一天天兴隆起来，家境蛮不错。可是，几年之后，“洋酒”开始充斥市场，日本的“太阳

麦啤酒”和美国的“怡和”“UB”啤酒竞争起来，高春圃自酿的小本“老酒”经受不了这些洋酒的冲击，生意开始萧条。到了小怡昌5岁那年，小酒店已濒临倒闭，家境每况愈下。到了1918年，小怡昌念小学的时候，小酒店终于倒闭了。年已花甲的高春圃，想到身边两个儿子和3岁的大女儿要念书，要吃要喝，无论如何不能断了经济来源的，他便走出去谋生，好不容易找到“兴隆”酒店，当了账房，月薪仅8元钱，以后月薪逐渐提升，直到1928年脑溢血夺去他的生命时，他的月薪也只有12元钱，他给妻子留下两男三女，最小的女儿年仅4岁。

小怡昌的母亲叫王蓉，出生于贫困家庭，性情温顺、善良、宽厚。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，家里人希望她成为“三寸金莲”闺秀，把她的双脚紧紧裹上布条，朴实坚强的她，每天啼哭不止，罢食反抗，坚决要求放脚，她母亲心疼了，心想女儿已经受够了贫穷的痛苦，难道还要再加罪给她受吗？也就把缠了3天的长长的裹脚布解掉了。她解放了，她自由了，不顾世人的窃窃议论，她用大脚走进走出，帮助挑水洗衣，虽然辛苦，但她心里是甜的。王蓉17岁那年，成了高家得力的主妇，她用那双坚实的大脚走着，用多茧的双手劳动着，以她那贤慧勤劳的性格操持着家务，她的每一步脚印都给儿女留下了难以泯灭的记忆。她虽大字不识，却善于讲故事，念歌谣。她每生养一个孩子，总要哼唱那闽南话的古老“摇篮曲”。孩子困了，她就边哄边哼：“呕呕困，一暝大一寸，呕呕惜，一暝大一尺。”孩子闹了，她就拉着孩子的小手边唱边摇：

摇呀摇，
摇到外婆桥，
外婆叫我好宝宝，

问我爸爸妈妈好不好？
我说爸爸好妈妈也好，
外婆听了笑哈哈！

孩子长到三四岁，她常给孩子讲那世代流传的故事：《虎姑婆》《傻女婿》《月亮姑娘》等，孩提时代的小怡昌，常常聚精凝神地在母亲怀中听着各种有趣的故事。

王蓉不仅是小怡昌慈祥的母亲，而且是他的启蒙老师，那些优美、神奇、饶有趣味的民间故事启发了怡昌最初的想象力，萌发了自发的朦胧的美感。

打锣找儿子

一天小怡昌吵着要跟母亲去买菜，母亲不让跟，哄他说回来带一块麦芽糖给他，没想到他说：“阿母，我什么也不吃，就想看菜市场有多大呀！”母亲看他这样执拗，这样好奇，就让他挎着空篮跟了去。起先小怡昌还能跟随在母亲身旁，到了菜市场，他被嘈杂的喊叫声和琳琅满目的菜摊惊呆了，渐渐地他落在母亲的后面了，生怕丢失孩子的母亲，把菜篮子拿过来，叫小怡昌牵着她衣角走，五花八门的市大大开拓了孩子的眼界，他怀着好奇的心情边走边四处张望，他简直是目不暇接，呵！原来外面的世界这样热闹，这样多人，这样多东西都是他从未见过的，走着走着，小怡昌被一摊捏糖小人的吸引住了，手中的衣角不知不觉地放松了，母亲看他专心看人家捏小人，便一再叮咛他就站在这里看，不要走开，待她在附近买完菜来接他，小怡昌点点头，也许听见了，也许根本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。他看见一个大孩子买了一串最大最高的五光十色的孙猴，那大孩子高举这串糖猴冲

出人堆，得意地走了，后面跟随着一群小孩，叽叽喳喳地喊着“孙悟空！孙悟空！”小怡昌不知不觉的跟着这群小孩走了，离开了捏糖人摊子，走出了菜市场……母亲转回来发现儿子不在，心马上慌起来，她冲向菜市场这头，又跑到菜市场那头，叫呀，问呀，就是没影儿。母亲呀，心焦如焚，怎么办呀，怎么办呀，泪水已浸满眼眶。她想，可能儿子自己跑回家了？她便急急赶回家，一进门又喊又找，仍不见影儿，母亲腿软了，哭泣起来，父亲听说儿子丢了，赶快找来打锣寻孩子的人，托他去四处寻找。打锣的人走街穿巷，打一下锣，喊一声：“谁家拣到一个5岁的小男孩……给重赏哟……”20世纪初的厦门，能有多大呢，从梧村到海口，两条大街和九弯十八拐的小巷子，一连打了3天锣，都没有找到。愁呀，愁死人。第三天傍晚，突然有知情者来相报，说是3天前在海口见到一个小男孩哭着迷了路，被一个老伯抱上船去石码了。高春圃立即赶往石码，经过一番打听，终于从好心的老阿伯手中抱回小怡昌。小怡昌紧紧搂着阿爹的脖子不放，父亲差点哭出声。父子俩赶上顺风船，一会儿功夫便在厦门上了岸。

晚上全家人围着小怡昌盘问：

“小孩子怎么可以一个人乱走？”阿兄第一个不高兴地说。

“你还出去吗？”父亲问。

“不去了，”小怡昌蹦着跳着大声回答着，他根本体会不了父母为他提心受怕的心情。

“为什么不去了？是不是没饭吃？”母亲总是生怕孩子饿着肚子，关切地插话。

“有肉吃，没有人给我擦屁股。”小怡昌道出了真情，大家一听，差点噗嗤笑出声。

“以后再跑出去，被人拐卖掉就回不了家了。”阿爹心里好笑，脸上却装着生气的样子。

“才不会呢，阿伯叫我不要哭，说坐着等，有人来带你回去。我给阿伯念了诗，阿伯还给我香蕉吃呢……”

“你念哪一首诗？念出来给大家听听。”阿爹捻着小胡须笑眯眯地说。

小怡昌兴奋起来了，一摇一摆大声念起来：

床前明月光，
疑是地上霜。
举头望明月，
低头思故乡。

全家人被他那幼声稚气的吟诗声逗乐了，紧张、生气的心情早被驱散了，笑得最得意的是阿爹，他想不到这个孩子几天前教他念的诗，他能一字不差地念出来。从此，他隔一两天，就用闽南腔调教他吟诵一首古诗。遇到客人来访，就叫他念给客人听。小怡昌也总是不使客人失望，一口气把阿爹教的全吟诵一遍。虽然他并不明白诗中的意思，但却也学着阿爹吟诵时的表情，时而高声，时而低沉，客人总是连声赞叹：“神童！神童！”

父亲动听的吟哦，在怡昌稚嫩的心灵中悄悄萌发了文学的幼芽。

“我要读书，死也不变！”

1917年，小怡昌已经7岁了，个子高高的，方方的脸庞显得鼓鼓的，两只丹凤眼出神地巡视着周围的一切，他好问，好联想，渴望上学，这一年他父亲的小酒店摇摇欲坠，快倒闭了，家里经济十分拮据。但高春圃没有忘记要让小儿子念书。小怡昌终于

盼到了这一天，父亲拉着他的手，来到厦门青年会小学，为儿子报了名。这是一所免缴学费的小学，老师看到小怡昌聪明伶俐，收留了他。从此，小怡昌如鱼得水。如幼苗获阳光雨露，他从书本上，从老师的讲述中，从同学们的交谈中获得了许多知识，小禾苗茁壮成长起来了，几个学期下来，他不但学习成绩优异，而且视野宽阔，但，家庭的困难给成长中怡昌的心灵上蒙上一层阴影，他心里装着不少的烦恼，最困扰他的是肚子经常叽哩咕噜地叫，他吃不饱饭，总处于半饥饿状态。他看看周围的同学：人家有新书包，他没有，人家有新衣服，他没有，人家有新鞋，他没有。这是为什么？他知道，因为父亲的小酒店倒闭了，父亲每天要去他人家的酒店工作，收入很少。到他念高小的时候，甚至连鞋也穿不起，只好穿着木屐去上学，在他走进教室时，同学们指指点点，笑他没穿鞋，下课后调皮的学生嘲笑他，叫他“木屐兵”，他干脆连木屐也不穿了。光着脚，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他怀着“走着瞧，我并不比你们差”的心态，昂首阔步地进进出出。父亲没能给儿子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，感到心疼内疚，一天，他试探地问儿子：

“昌，你阿兄 10 多岁就去工作，你也去做工吧？”

“不，我要读书！”

“连鞋也没有，就不要读了。”父亲喉咙哽咽了，苦涩得说不下去。

“我要读书，死也不变！”

父亲被儿子坚定的意志感动得溢出了泪水，转向儿子的母亲说：

“这孩子励志，读吧，读吧。”

这时小怡昌已有了两个妹妹，全家 6 口人，靠父亲一点微薄的收入，实在难以维持，每当过不下去的时候，母亲就翻箱倒柜，

找出一二件比较值钱的衣物,叫小怡昌拿到当铺去典当,小怡昌站在比他高一个脑袋的柜台前,看到老板向他投来冷漠,讥笑的目光,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刺激,他开始察觉到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不公平,小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伤痕,留下了愤恨,留下了反抗的情绪。

小怡昌9岁那年,中华大地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——“五四”运动。作为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化革命,喊出了反对旧文学,反对文言文,提倡新文学,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声,新文学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。新与旧、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十分激烈,厦门虽远离文化风暴的漩涡,但也受到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影响,这一切,深深地影响了小怡昌。

求知欲望强烈的他与家庭艰难的经济状况,形成了尖锐的矛盾,小怡昌在这矛盾中和重压下断断续续地念着书,辍学了,又复学。直到1924年,14岁的怡昌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了,他感到自己胜利了,内心充满了喜悦。他多么渴望自己能 and 同学们肩并肩,背着书包走进中学的大门。然而,这只是梦想,等待他的是失学,家里没钱,如何升学?这无情的打击,使他痛哭了一场!命运呵,为何这样不公平?怎么办?生活无着,升学无力,工作无门,小怡昌就这样以失学的苦闷心境告别了童年。

“我们不能坐着挨饿”

忧郁的乌云笼罩着怡昌,英俊少年,几多忧愁,几多烦恼,有谁能理解?有谁能分担?他每晚都做着那永远圆不了的梦:他和许许多多同学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,下课了,许许多多同学围着他,听他讲故事,上课铃响了,他却进不了教室门,因为他没

缴学费，——着急，醒了，原来还睡在床上。

上学的美梦，幻灭了。

一天，高春圃心酸地对儿子说：

“昌，阿爹对不起你，没钱让你上中学，你就在家自学吧。”

从此，高春圃当起儿子的“家庭教师”。每天工作回来，就给怡昌讲古诗文，炎热的夏日，父子俩坐在阴凉的过道上，父亲摇着大芭蕉扇，滔滔不绝地讲，儿子聚精会神地听，幽默诙谐的父亲，有时会突然举起茶杯，说：

“来，我们对酒当歌。”

父子俩高举杯子，杯碰杯，面对面，以茶代酒，一饮而尽，然后开怀大笑起来。只有这个时候，怡昌才忘掉了失学的痛苦，他最爱听也最使他听得入神的是父亲讲述陶渊明那“冷傲”“孤高”的故事，父亲有一次绘声绘色地讲：陶渊明在亲友的劝告下，再次出仕，做了 80 多天彭泽令，有一次郡里派一个督邮来县里，县吏叫他束带迎接，以示敬意，他说：“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”，当天他就离职回乡了。年幼的怡昌十分激动，他钦佩陶渊明敢于藐视权贵，他牢牢记住父亲讲解做人的信条：“施恩不望报，受施慎勿忘。”这种道德观，一直影响他做人的态度。

然而，家里这些又黄又破的古书，早已不能满足求知欲强烈的怡昌，他从外面捧回了“五四”运动后出现的新文学作品，这些新书对他极有吸引力，他读得入了迷，他对文学浓烈爱好已露出端倪，只要是“文学研究会”“创造社”的作品，他抓到就读。那些带有叛逆性、要求个性解放的作品，很快被他吸收，引起共鸣，渐渐形成了不满现实的反抗性格。最初，他喜欢读郁达夫的小说集《沉沦》，小说中主人翁反叛精神和感伤情绪直接影响了他，他总是把自己和小说中的主人翁联系在一起，想到自己处于贫寒家境和失学的苦闷心情，感伤情绪便自然地涌上心头，但他仍在

充满泥泞的道路上，一步一步地迈着沉重而坚实的步伐。

他以失学的痛苦心情送走了1924年。元旦过后，旧历的年关将至，家家户户都在备年货、扫尘、蒸年糕、做新衣，可是怡昌的家，却在为赊欠的账所困扰。本来阿兄怡吉开了个小小的画像馆，还多少担负点家计，可现在也无能为力了。怡昌性格热情，健谈，善交朋友；怡吉却沉默寡言，少有朋友往来，却善于观察，他非常聪明，自学画画，很快就显露才华，他第一次赚到一笔钱是为厦门大学画了一幅全景，在他不到17岁的时候，向父亲提出要开个画像馆，父亲帮他筹措资金，果真在厦门思明电影院对面开起了“美航画像馆”。他曾为高寿的父亲画了一幅肖像，飘动的苍髯，传神的眼睛，逼真的表情，肖像高高悬挂在像馆墙壁上，引来许多过往行人驻足观赏，啧啧称赞不绝。颇有名气的他，生意做得沸沸扬扬。可不到两年，从国外传进来的照相行业发达起来了，手工画像生意开始萧条，最后他只好关闭画相馆，善于观察而不善于言词的怡吉，叫他去谋职业，对他来说实在艰难重重，画家已一贫如洗，当然无法替家里还清所赊的账。这一天，全家正在发愁，忽然敲门声响了，大家以为是来讨账的。门开了，却是邻居阿伯，他一手拿着红纸，一手端着砚墨，要请怡吉为他写一副春联。怡吉这时不但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，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，他立即为阿伯挥毫写了春联。

阿伯走后，怡昌站起来说：

“我们不能坐着挨饿，不如走出去写春联卖几个钱！”

怡吉难为情地说：

“到街上摆摊？让人家来看我这个画家变成卖春联的？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，你尽管低头写，其余的我来干。”怡昌坚持着。

怡吉摇摇头，一阵沉默。

怡昌看到哥哥不说话，心里好着急，他执意要出去奋斗一下，摆脱目前的困境，便又说：

“总比人家来要账好得多呀！”

怡吉仍是沉默不语。

“试试看也好，不要紧的。”母亲说话了。

“那我只管写，”好一阵子，怡吉才开口说。

怡昌听阿兄说这句话，精神大振。当晚便忙碌起来，裁剪红纸，备好笔、墨、砚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怡昌二话没说，钻到桌底下，用头顶起饭桌就出门，他一直把桌子顶到大街上，找了个合适的地方，才蹲下来把桌子放下，从桌底下钻出来。那劲头别提有多兴奋，他为哥哥摆开阵势，又研墨、又扶纸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：写春联，写春联，过新年，过新年。哥哥头也不抬，只顾写，每写一副，弟弟就卖一副。围观者渐渐多起来，最后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抢着买那墨汁未干的春联，也许人们赞赏那刚劲有力的字体？也许人们亲昵那小兄弟配合得可爱？买春联的人们从早到晚络绎不绝。没想到，怡吉竟连写3天，怡昌也连顶3天桌子到大街上去摆摊，直到大年三十晚上，竟然还有人敲高家的门要求买春联。

兄弟俩奋斗了3天，赚了些钱，虽不多，但还清了赊欠的账，还备了点年货，全家喜气洋洋地过新年。怡昌做了这件事后，深切懂得了一个道理：奋斗才能生存！

然而，失学和饥饿的痛苦仍然像铁链紧紧缠着怡昌，他忧郁，孤寂，苦闷。一天，他沿着厦门港海堤一步一步走去，饿得心慌，他像这大海中飘荡的孤舟，不时被汹涌卷来的骇浪撞击着。突然，在他的身后伸过来一只干瘪的黑手，颤颤抖抖地向他乞讨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，空无一文。他痛苦摇头，快步走开，不敢回头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恨情绪包围了他，他在心里呐喊

道：为什么有的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，有的人却挣扎在死亡线上？社会如此不公平，我难道就这样听从命运的摆布？不，我一定要奋斗，我一定要改变这贫苦的生活！怡昌不再往前走了，他怀着愤懑不平的心情转向市内，疾步走去。

怡昌来到同善小学，找到他的老师，这是一位看着他长大的老师，老师十分同情他的处境，便帮助他在同善小学找到一个代课的职业，15岁的怡昌正是金色的年华，本应背着书包，迎着初升的太阳进学校去念书，可是他现在，却冲向了社会，以自己年幼的一股冲劲，站到那高高的讲台上，给小学生讲课。他，过早地进入了社会，过早地成熟了。

15岁的孩子当老师，尽管怡昌自己多报了两岁，但还是一脸的稚气，怡昌便找来一副平光眼镜戴上。照照镜子，显得老成多了，自己感到很满意。从此，这眼镜便伴随着他度过多年的教书生涯。

这一年，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事，留给怡昌很深的印象，1925年5月30日，帝国主义在上海血腥屠杀中国工人、学生，帝国主义的暴行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全国各地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。“五卅”惨案的消息传到厦门，厦门大学开始罢课，师生集队到市区游行，在街上进行演讲，散发《为五卅惨案罢课宣言》的传单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。接着，厦门各界群众也纷纷起来上街游行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掀起来了，各大、中、小学的学生连连走上街头，开展反帝爱国宣传，组织“纠察队”，检查“仇货”。怡昌以老师的身份也参加了斗争，他带领学生，手拿小旗，走在队伍的最前头，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。这是他第一次走向社会，第一次参加斗争，他感到自豪，感到浑身是力量，感到自己长大了。